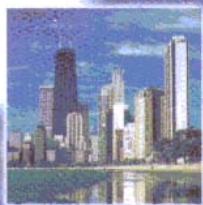


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刘国光 马蔼乃 文伏波



长江地区
CHANGJIANG RIVER REGIONAL
城乡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主编 伍新木 张秀生

武汉出版社

2-127.5
VLSI

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刘国光 马蔼乃 文伏波

长江地区 城乡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CHANGJIANG RIVER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主 编 伍新木
张秀生
副 主 编 冷国邦
宋 栋
专家主审 李京文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地区城乡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伍新木,张秀生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10 (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刘国光等主编)

ISBN 7-5430-1998-1

I.长… II.①伍… ②张… III.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长江流域 IV.F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927 号

书 名:长江地区城乡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著 作 责 任:伍新木 张秀生

责 任 编 辑:林 华

责 任 校 对:徐建文 李 俊

封 面 设 计:吴 涛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40 千字 插 页:7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ISBN 7-5430-1998-1/F·150

定 价:22.5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导言：《围城》的启示

杨绛在给电视剧《围城》片头的题词中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一题词，最准确地概括了《围城》的主题，也最明澈地传达了钱钟书的“悲剧之悲剧”的美学思想。“围城心境”揭示的是深刻的人生哲理。

《围城》是文学艺术，《围城》也给我们的经济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人类营造一个这样的空间：人们能从容地走进城市或农村，这里没有设“围”，既没有城市的围墙，也没有农村的藩篱，没有体制和制度的障碍，没有心理和观念的羈

绊,也没有城乡的文明冲突,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城市或乡村,像候鸟选择栖息地一样;或者我们把城市和乡村都建设得很好,让人们能喜欢他们居住的城市或农村,根本就不会产生“围城心境”,不会有逃出来或冲进去的杂念;或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让城乡不再存在本质差别和根本利益的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我们要建设的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就体现了这样的追求和期盼。

1 长江地区的城乡历史源远流长

1.1 城市的起源

1.2 长江地区城乡建设的漫长历程

1.3 21 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

1.4 21 世纪的城市

1.5 21 世纪的乡村

长江探源可以破译长江的许多秘密,探索长江地区城乡的历史渊源,可以揭示长江地区的城乡怎样淌过了历史的长河,又将流向何方。

1.1 城市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和乡村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城市和乡村根本利益的对立是阶级对立的表现,人类发展的前景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终消灭包括城

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这些光辉的思想不仅可以科学地解释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可以指导我们建设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城乡。

1.1.1 走出森林

一百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森林古猿从森林中走出来,从爬到走的演进经过了数百万年,人类从直立行走到现在又经历了一百万年。当然,如果从人的社会行为来看,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在“爬行”,不仅屈服于自然力,更屈服于人类自己虚拟的各种偶像,人类的解放程度还是很低的。百万年前,没有喧闹的城市,也没有恬静的农村,只有森林、湖泊、草原、河流和高山。“站起来”既是人类生存的起点,也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起点。

1.1.2 可贵的剩余

大约一万年以前,人类的食物采集有了“剩余”,于是将剩余变为种子,有了原始的种植业和农业。人类的狩猎有了“剩余”,于是将剩余的野兽、野禽变为饲养的家畜家禽,这样便有了原始的饲养业和畜牧业。畜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种植和饲养使人类必须相对定居,也有条件相对定居。“掘土以居室”,“架木以筑巢”,巢氏是人类住宅的发明者。人类从游牧走向定居是一大进步,在现代文明社会,人类从定居走向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也是一大进步。最早的原始定居生活的出现形成了早期的村落,从现有史料和考古成果看,中

国原始农业、原始村落诞生地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

相传在长江中游、云梦泽畔的历山,神农氏发明耕作农具,首倡农业。《白虎通·德论》中说:“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神众乃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淮南子·修务训》中又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剩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标志,剩余是可贵的,有了剩余才有社会分工。分工越细,剩余越多;剩余多了,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分工。

1.1.3 聚——邑——都的演变

聚,是村落,是农村,是城市的母体,它孕育了城市;邑是居民点,有市之邑是城市的雏形;都,是早期城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书·沟洫志》也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原始人群曾经“穴居野处”,“钻木取火”,漂泊不定。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定居成为必要和可能,于是出现了原始的早期村落,如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落遗址就是明证。

耒耜农业,沟洫制度,是农耕文明的巨大进步。农业与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进步,剩余产品的出现又使产品交换成为必要和可能。《易经·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就是原始市集,交易场所不固定,以物易物,交换品种简单,数量很小,距离不远。

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技术得以改进,制陶和冶炼技术进步了,导致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正是这次社会大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①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交换品种、数量的增多和距离的扩大,使交易场所也由原始市集逐渐形成为固定的集市,可见市早于城。

我们在演绎社会生产力这条社会脉络的进化轨迹时,还要关注社会分工、产品交换同步的变化。种植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分工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我们不仅要关注生产力、社会分工的变化,还要关注社会制度的变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制开始萌芽,人类社会逐渐分裂成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立阶级,奴隶制国家也应运而生,从而开始了我国居民区形式的又一个新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的时代,我国早期城市产生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4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起源说

我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对此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有多种见解和假说。

一是防御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城市的起源,尤其是城堡的产生,是统治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筑城以卫君”,所以,高墙深池和择险而筑是中国早期城市的重要特征。二是集市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是作为市场中心而兴起的,它起源于贸迁市集之地,经《易》中的“日中为市”,《国语》中的“争利者于市”,以及《史记》注中的“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都是“市井”说这一见解的有力证明。三是宗教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城市是宗教中心,当时以血亲制度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部落联盟中心和早期城市的建设,是以宗庙作为“先王之主”,“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起源说,并不完全否定这些假说的合理性。防御设施的建立、剩余产品的交换、氏族中心地的确立,无疑都是早期城市的诱发因素,但最本质的原因应该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

对立的运动。”^①

1.2 长江地区城乡建设的漫长历程

1.2.1 长江古城——盘龙城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临长江小支流府河,距现在武汉市市区仅几公里,人们将它称为武汉的前身。早在3500多年前,盘龙城就是一座占地7万多平方米的城市,考古工作者在城墙和宫殿附近的文化层发现了大量早期陶器的陶片,说明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并渐次进入了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也由城郊向城缘移动。

1.2.2 战国楚都沿长江流域五迁

春秋时代有诸侯国140多个,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坐大,秦、楚、齐、魏、赵、韩、燕最强,随着这“七雄”实力的不断变化消长,核心城市也随它们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的变化而不断转移。楚国都城五次沿长江流域迁移。楚国最初定都丹阳(秭归),春秋时楚文王定都枝江,后一迁郢(江陵),二迁都(宜城),三迁郢,四迁陈(淮阳),五迁寿春(寿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3 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相对落后

东汉时期城市空间分布表

表 1-1

	校尉部 刺史部	郡城数 (个)	县城数 (个)	合 计 (个)	占全国城 市的比重 (%)	郡城数:县城数
黄河 流域	青 州	5	58	63	5.9	1:11.6
	兖 州	8	77	85	8.0	1:9.6
	司 隶	6	92	98	9.2	1:15.3
	冀 州	9	89	98	9.2	1:9.9
	并 州	8	79	87	8.2	1:9.9
	小 计	36	395	431	40.5	1:11.0
淮河 流域	徐 州	4	55	59	5.6	1:13.8
	豫 州	5	86	91	8.6	1:17.2
	小 计	9	141	150	14.2	1:15.7
长江 流域	扬 州	6	84	90	8.5	1:14.0
	荆 州	7	101	108	10.2	1:14.4
	益 州	11	65	76	7.1	1:5.9
	小 计	24	250	274	25.8	1:10.4

资料来源: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初而稳定的阶段,郡县制确立,农业、手工业产品增加,旧城市扩大,新城市兴起,城乡人口数量增加,全国城镇网络初步形成,城市的分布偏重于黄、淮流域,长江流域相对落后(见表 1-1)。

1.2.4 盛唐时期城市重心南移长江流域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出现了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长安,堪称“世界首都”,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市(面积 84 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的 10 倍)。很重要的是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出现了变化,由于商业兴旺,出现了以水运港口城市为主的交通城市,陆运交通的驿站、军需供应的草市兴起,使城市范围扩大。特别是黄河、淮河、长江、大运河成为全国两大经济中心区物资交流、汇集的主渠道,沿岸相应形成了一批交通贸易河港城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发生了三次大的迁移。一是东汉末年的人口迁移。东汉末年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动乱,军阀混战使黄河下游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二是两晋南渡。《宋书卷三十五·志》记载,此间中原地区生民绝减,且将大半,南移人口 90 万。三是中唐“安史之乱”,出现了“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的情况。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直到宋室南渡。这三次人口大规模迁移,使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南移,城市空间分布重心也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由表 1-2 可以看出,中唐时期黄淮海流域县城废弃甚多,县城总数仅及东汉时的一半,所占全国城市比重,也由东汉时的 $1/2$,下降为 $1/5$;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则发展很快,中唐时期比东汉时期县城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约占全国县城总数一半左右。全国城市空间分

布的重心明显地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中唐时期县级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

表 1-2

	东汉时期			中唐时期		
	行政区	县城数 (个)	占全国城市 的比重(%)	行政区	县城数 (个)	占全国城市 的比重(%)
黄淮海流域	青州	58		河东道	81	
	兖州	77		河南道	131	
	司隶	89		都畿道	37	
	冀州	92		京畿道	37	
	并州	79				
	徐州	55				
	豫州	86				
	小计	536	55.49	小计	286	21.80
长江流域及 东南沿海	扬州	84		淮南道	10	
	荆州	101		江南东道	80	
	益州	65		江南西道	65	
	交州	35		岭南道	163	
				山南东道	72	
				山南西道	55	
				剑南道	151	
	小计	285	29.50	小计	596	45.43

资料来源: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由于人口和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至唐末我国城镇的空间分布结构开始出现了长江城市发展轴线。汉、魏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其沿岸以及

“三吴”地区经济繁荣,大大小小的水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小城市融为一体,形成一条东西向的发展轴线。在这一时期,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为长江下游大港,秦淮河两岸市集众多,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夏口(汉口)、江陵、成都与南京并称长江流域六大都市;沿江浔阳(九江)、余杭(杭州)以及沔水(今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港口城市。至中唐时期,长江干流(下游至重庆)沿江即有州城 15 个,县城 19 个,重要集镇 18 个(见表 1-3)。

中唐时期沿江城市分布表

表 1-3

单位:个

道	州 城	县 城	镇
江南东道	润州(镇江)	江阴、江宁	下蜀戍、石头镇
淮南道	扬州、和州(和县)、沔州(汉阳)	江都、乌江、望江	白沙、瓜步、梁山、穆潭、枞阳、皖口、蕲口
江南西道	江州(九江)、鄂州(武昌)、岳州(岳阳)	当涂、秋浦、武昌(鄂城)	采石戍、芜湖、赭圻、鹊头、梅根监、湖口戍、樊港
山南东道	荆州、峡州(宜昌)、归州(秭归)、夔州(奉节)、万州(万县)、忠州(忠县)、涪州(涪陵)、渝州(重庆)	石首、公安、枝江、松滋、宜都、兴山、巴东、巫山、云安(云阳)、武宁、丰都	下牢镇、大清镇
合计	15	19	18

资料来源: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长江流域城市发展轴线的形成,使昔日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千金之家”^① 的景况变为了“江南之为国盛矣”“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少间,不能比也”“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② 的盛景。

1.2.5 近代沿江沿海开埠城市的出现

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发展的历史轨迹,明显地呈现出沿河(黄河、淮河、运河)——沿河、沿江(长江)——沿江、沿河——沿海、沿江——沿江(长江、珠江)、沿海并重的双轴线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城市的出现,是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我国沿海沿江港口开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城市。这类城市沿海有 20 个,沿长江有 13 个,分别是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岳阳、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

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和沿海的城市明显发展。全国 10 个 5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全部在这一地区,19 个中等城市有 16 个在这一地区,193 个小城市有 147 个分布在这一地区。长江是黄金水道,开埠以后,分别形成了以上海、武汉、重庆为中心的三个城市群。当时长江地区的

① 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 见《宋书》。

城市总数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41.5%，大城市占 40%，中小城市占 50%，城市密度高于沿海，形成全国城市最密集的城市轴。据统计，1843 年长江下游有 330 个城镇，城镇人口比重为 7.4%，1893 年城镇人口比重曾高达 10.6%，而 1850 年世界城镇人口的比重平均为 7%，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曾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但近代从总体上看，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1.2.6 新中国城市建设的曲折历程

1949—1957 年是我国城市健康发展期。1949 年我国设市城市为 136 个，1957 年增加到 176 个，城镇人口比重由 1949 年的 10.6% 上升到 1957 年的 15.4%。1958—1965 年是我国城市起伏发展期。1958—1960 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大炼钢、人民公社化高潮，城镇人口由 1957 年的 9949 万猛增到 1960 年的 13073 万，城镇人口比重达 19.7%，新设市 44 个。1961 年后又大量压缩城镇人口，撤销 52 个城市，动员 3000 万城市人口返乡，1965 年城镇人口比重降为 14%，城市数降为 169 个。1966—1976 年是我国城市停滞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把城市视为“资产阶级大染缸”，这场以“缩小三大差别”、“建设新农村”为口号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既使城市萎缩，也使农村出现大量过剩劳力，使农村经济停步不前。此间强制大批城镇居民、干部、知青下乡，12 年间共有 1623 万知青、67.9 万大学毕业生下乡。1976